

# 从“卫生有道”题词透视卫生观念转变及影响

张爱林

南京医科大学江苏省健康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1166

**摘要:**蔡元培1935年为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南京医科大学前身)首届毕业生题词“卫生有道”,寄予着殷切期望,蕴藏着时代之变。1928年,国民政府建立。当时社会剧烈变革,“卫生”观念也从注重个人“养生延年”转向公共领域的“防疫强种”,需要在卫生政策、卫生教育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积极作为。省立医政学院师生顺应和引领时代潮流,积极服务推动国家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卫生有道”的理念。

**关键词:**卫生;公共卫生;卫生教育;蔡元培

**中图分类号:**R-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23)05-462-005

**doi:**10.7655/NYDXBSS20230511

1934年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南京医科大学前身)建校,主张卫生教育、卫生行政与医疗事业三者并举,以政治方式统合有限的卫生资源以求更好的效果,首创“医政”教育模式。1935年,学校一年制卫生行政科、卫生教育科和卫生特别训练班首届毕业生<sup>①</sup>顺利毕业,其中涌现出郑国锷(院士)、高梅芳(著名公共卫生专家)等一批杰出代表。学校精心印制毕业生纪念刊<sup>②</sup>(以下简称纪念刊)。这是当时高校的普遍做法,主要为宣传办学成效,方便招生,也为了密切联系校友。纪念刊有名家或单位集体题词合计40幅,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蔡元培题词“卫生有道”为其中重要的一幅(图1)。

## 一、纪念刊题词概述

纪念刊制作极为用心,扉页为孙中山先生遗像,其后是先生遗嘱,接着是校长肖像、发刊词、名家题词,再后是学校环境、教学科研以及教职工头像等图片,然后是教师赠言、学校科研成果,最后是教职员通信录、毕业生通信录以及商业广告等。题词占正文近四分之一篇幅。为窥见题词全貌,本文以题词者身份<sup>③</sup>为纲,简要列表如表1。

题词人员中,政要人物为16人,占比最高。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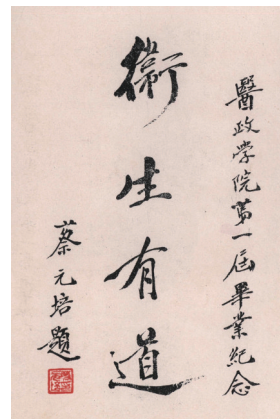


图1 蔡元培题词“卫生有道”

到文化名流及医学专家中多有从政经历,实际占比将更高,在那个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官的时代确属平常。医学名家里面包括上海名中医蔡禹门以及民国反中医的代表余云岫、汪企张等,在当时中西医交恶的历史背景下更凸显了学校开放包容的办学态度。

细读题词,除潘公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焦易堂“人文蔚起”,程天放“仁心仁术”等应景之作外,几乎所有题词均结合卫生行政、卫生教育专业特点,聚焦医疗卫生,特别是公共

**收稿日期:**2023-09-01

**作者简介:**张爱林(1980—),男,山东郓城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教育管理。

① 省立医政学院学制多样,有五年制临床专业,也有短期医学培训班,主要应对当时社会缺医少药的情况,加快人才培养以更好服务社会。卫生教育科的学生毕业后由政府安排深入基层开展卫生宣传和管理,移风易俗,可看作我国早期公共卫生的工作者。

② 考虑到题词人身份多元,如蔡元培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也做过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仅以题词人1935年的主要社会身份为准。

表1 题词具体情况

类型	题词者或单位	题词内容(部分)	备注
政要人物	叶楚伧、褚民谊、戴季陶、钮永健、陈立夫、焦易堂、罗时实、余井塘、程天放、罗良鑑、赵棣华、丁超五、王柏龄等16人	叶氏题词: 铤中铸外大胆细心 褚氏题词: 保健起衰 戴氏题词: 寿世福音 罗时实题词: 努力民间 王氏题词: 强我种民 赵氏题词: 人群健康之福, 民族卫生之光	戴季陶署名戴传贤
文化名流	蔡元培、陈大齐、冷遯、沈百先、翁之龙、柳诒徵、姚鹓雏	蔡氏题词: 卫生有道 沈氏题词: 医鼎之光 翁氏题词: 强国之基 柳氏题词: 活国竹桃	姚鹓雏为学校国文教授
医学专家	余云岫、潘公展、颜福庆、吴祥凤、汪企张、蔡禹门、陈方之、王佶、盛佩葱、顾毓琦、庞京周、胡宣明、尹莘农	余氏题词: 陶铸扁庐 颜氏题词: 萃兹英才以立医政, 树永久之规模, 辟健康之途径, 无远弗届, 兆民有庆 蔡氏题词: 寿世导师	余云岫署名余严; 王佶、顾毓琦、尹莘农均注明了医药院校校长身份
单位集体	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全国医师联合会、上海市医师公会、江苏医科大学同学会	医药学会: 促医政之完备, 树强国之先声 医师联合会: 强民之基	

卫生关于“保健”“寿世”“活国”“强种”“强国”等功能,成为蔡元培“卫生有道”题词有力的注脚(图2)。今天读来,感觉这些题词对卫生及“卫生有道”的解读顺理成章,并无特别之处。可翻阅“卫生”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其语境内涵恰在国民政府前后发生了剧烈改变,背后是诸多仁人志士高举“卫生救国”旗帜,为之接续奋斗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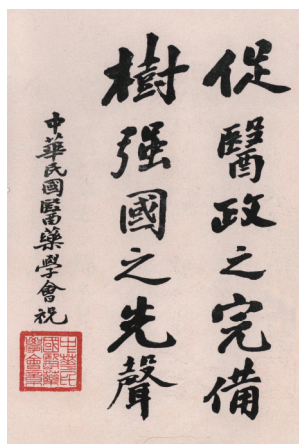


图2 中华民国医药学会题词

## 二、卫生之“道”的转变

“卫生”一词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延续至清末均为个人“养生延年”之意,题词中“健康”“寿世”等字样依然保留着部分本意。鸦片战争后近百年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部分民族精英倡言公共卫生对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大力开展卫生教育,推动政府政策改革、移风易俗,“卫生”逐步转向了公共领域的治病防

疫和强种强国,助推了国家近代化进程。

### (一)传统卫生之“道”

“卫生”最早出自《庄子·庚桑楚》,原本跟随庚桑楚学“道”的南荣越去请教老子“愿闻卫生之经”。老子告诉他“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sup>[2]</sup>鼓励南荣越与自然和谐相处,向婴儿(赤子)学习,体现道家清静无为、淡泊平和、顺应自然的主旨思想。晋代李颐《庄子集解》将“卫生”注解为“防卫其生,令合其道也”。宋代的王雱进一步指出卫生就是“卫全其生也,能卫全其生则生所以常存,故曰卫生之经也”。卫生即“保全生命,维护身体健康”之意。明嘉靖年间,科举状元罗洪先曾编写一部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读物《万寿仙书》,单列《卫生宝训》一章,其中多涉四季饮食禁忌、十二时调息以及静功却病<sup>③</sup>等方法<sup>[3]</sup>。直至清同治年间出版的《卫生要术》,记载的也是八段锦、易筋经等强身修炼的内容。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无“卫生”字样,但主张并无二致,如“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sup>[4]</sup>可见,传统的“卫生”讲求通过适度的饮食、运动、作息、吐纳等方式保持精气的充沛、功能的协调,以促进健康,延长寿命。1921年,被誉为民国时期“中医辞海”的《中国医学大辞典》出版,明确将“卫生”解释为“防卫其生命也”,内涵始终聚焦于个人的身体及寿命。

### (二)“公共”卫生之道

国民政府建立前后,外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影响,国家政体、思想观

<sup>③</sup>《卫生宝训》强调:清晨一碗粥……泻后两三日,以薤白粥加羊肾空心服之,胜服补药。大寒与大热,且莫贪色欲,醉饱莫行房,等等,都是个人保健和生活习惯的内容。

念为之一新;内有东北庚戌鼠疫等大型流行病造成的数以万计人员的死亡,迫使全国上下对卫生事业进行深刻的反思<sup>④</sup>。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卫生不仅仅是个人的保健和长寿,更涉及政府机构、城市规划、污水处理、疾病预防、医院建设以及民众风俗习惯改良等各个方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这一时期的鲜明导向就是将“卫生”与“公众”联系起来,更加突出其社会性。1920年之后,广州的公共卫生及预防疾病运动全面开展,广州博济医院首设公共卫生科。1927年“科学救国”发起人之一的黄子方积极呼吁,主张将公共卫生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所以要求国家的生存,要谋民族的自救,非但只在军备上求自卫,还要谋文化上所必需的各种文物的建设,科学新医便是这种科学文物的建设中之最要者”,甚至直接把卫生医学隐喻为国家集体衰败和强盛的关键,身体的强弱被暗示为国家力量的强弱<sup>⑤</sup>。1928年,曾创办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的兰安生(John.B.Grant)首次系统提出“公医制”的构想,他在对比欧美等国家医疗体系之后,建议中国按照国家、省市、城乡地域范围,有计划地培养优秀的公共卫生人才<sup>⑥</sup>。1930年,卫生部官员梅贻琳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提出,“凡百设施,皆以其国内男女老幼之健康为目的,故疾病之预防及治疗皆完全置于国家负担之下。国家对于国民之疾病、伤残、失业、妇人生产,及孕妇护卫等,皆绝对负责”<sup>⑦</sup>,可算作政府对学者关于公共卫生构想的一次正面回应。不过,梅氏也坦承国家推动公共卫生的主要困难在于人才不足。当时,卫生“乃社会公共之事业,非一家一己之卫生,必以社会公众之团力而切实施行,乃克收其效果”<sup>⑧</sup>逐步成为社会共识,培养有专业知识、有热情干劲的专门人才深入群众中宣传发动显得紧迫而重要,这与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成立并组建卫生行政科、卫生教育科和卫生特别训练班已遥相呼应。

### (三)卫生观念转变原因

卫生观念转变的过程持续时间长,涉及因素多,概括分析大概有以下三种。一是中医内部论争开其先声。至民国初年,中医一直占据我国医疗的主导位置。明末疫病横行,传统的伤寒法治疗效果不佳,吴有性提出瘟疫的流行是疠气或疫疠之气所致,写作《瘟疫论》,创造了温病学派,开创了传染病研究之先河,到清代已蔚为大观。中医内部形成了“温病新学”与“伤寒旧学”的论争,将“卫生”逐步引向了公众层面。从《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可以看

出,民国期间温病著作竟多达两百多部,其中瘟疫31部,疟痢24部,霍乱鼠疫等53部,不仅可以推测当时传染病盛行的情况,也可以了解中医重视“公共卫生”的程度。二是西方细菌学立其理论基础。随着近代西医的传入,国人对西方生理学、病理学和免疫学等逐渐了解并熟知,当时包括中医院校在内的医学院陆续开设了细菌学课程。细菌学说不仅将微观世界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且有力论证了疾病源头、传播路径以及治疗手段的科学性。“古无传染病之说,皆以为瘴气……至于今日,除我国之外,世界文明社会几无人不知道细菌,几无人不知传染病之病原为细菌之祟。故一切公共卫生之道,易行而日精。”<sup>⑨</sup>尤其建立在细菌学背后的卫生观念的转变,逐渐推动了当时身体观、医疗观和医政观等诸多领域的变革,推动了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三是政治体制设有强力保障。1905年清政府在巡警部设卫生科,后在民政部设卫生司。辛亥革命后,政府内务部设卫生司,1928年国民政府改设卫生部。其后机构设置虽有反复,但推进医疗卫生进步并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决心一直未曾改变。中央和地方政府更是为此出台了许多政策,花费了不少气力<sup>⑩</sup>。医学与行政捆绑在一起,被赋予了极大责任:“谁谓定不能胜天乎?传染病方面之防疫学,人种改善方面之遗传学及优生学,犯罪问题,则有法医学、刑事精神学,教育方面之教育病理学,其他如保险医学、民族卫生学,其应用之范围,固不仅以个人为目标,应知医者今后对于社会之职责,日益重大……若能应用医学,以救济社会之病态、人生之焦躁,生活上不能满意之事件,不能解决,而法律亦可因之解善。社会卫生学,为改良社会问题急务之先。”<sup>⑩</sup>卫生不仅可以治病救人,优生优育,更可以解决犯罪、教育等系列问题,被赋予了无限期冀与责任,可以称之为“上医医国”的现代版本。当然,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卫生“有道”的另一层深意。

## 三、卫生何以“有道”

1934年,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成立。陈果夫任院长,胡定安任教育长。学校命名“医政学院”而不是“医学院”,有着通盘考虑。陈果夫曾在《纪念刊》论述,“现代卫生事业,合卫生教育、卫生行政及医业三者而成。此三者相辅以行,缺其一,若鼎折足:整个卫生事业,即无以建立,国人往往忽此三者相互之关系……我国卫生事业之所以不振,此其大因

④ 当时国家卫生条件极为落后,北京协和医院在20世纪初的一次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河北农村人口平均寿命不到40岁,年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三十五,婴儿死亡率是惊人的千分之二百,60%的饮用水受到人畜粪便的污染,一个县往往只有在县城有几所开业的医院,将近一半的村庄里,连个土郎中都没有。

⑤ 据《医界春秋》1934年第87期专门介绍,当时各省在中央政府号召下积极推进公共卫生。湖南省公布了公共卫生大纲,要求在湘雅医学院培养专门人才,同时普及种痘及防疫注射,普及助产、医药救济、工厂卫生等,实施特种传染病管理,开展流行病学研究,并特意提到在5年之内将全省三千万人全部接种完毕。

也。今本院治三者于一炉,而以整个卫生事业,使诸同学分其行,总其成,诸同学将惟以本省整个卫生事业之成绩为成绩”<sup>[1]</sup>,阐述了办学理想,对毕业生寄予厚望。在陈氏看来,医一人者为医生,医天下者为医政。对于为什么开设卫生行政、卫生教育专业,胡定安的理由更为简单。“卫生行政,重在预防,本来也属预防医学之范畴,医学院校中虽然也有卫生学科,可是卫生行政事项,却非一般普通医师所能胜任愉快,国内医校中设有卫生行政专科者,尚属创举先见。”“卫生教育,是一种新兴的学科。它配合着教育原理和技术,唤起了社会大众关注医学卫生,增进国民保健,它能协助卫生行政的顺利推行,减少消极的医疗工作。”<sup>[11]</sup>可以想见,陈氏、胡氏的言行正是卫生“有道”的内在要求和生动阐释。1935年,学校卫生行政科、卫生教育科和卫生特别训练班首届毕业生们带着社会上下的期盼,走向各自岗位,以实际行动去践行“卫生有道”的嘱托。具体来看,学校及毕业生在当时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

#### (一)开展学校卫生教育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在校学习期间更易形成良好的卫生观念。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以教育为工具,以改良生活为目标”“健康教育从学校抓起”等口号,将学校作为卫生教育的一方重镇。1936年,在江苏省政府主席(兼省立医政学院院长)陈果夫的主导下,政府要求各县教育局添设1名卫生教育指导员,学历须为大学或独立学院卫生教育科毕业,部分医政学院毕业生担任了指导员职务。从现有资料看,当时明确了中小学卫生教育的目的:养成卫生意志、卫生习惯及态度,增进卫生知识,训练儿童的社会效能及适应能力,陶冶优美的情操。明确了卫生教育的具体内容:晨间检查、定期健康检查、传染病之预防、饮料水及食物之检查、联络卫生机关、增进教职员工的健康等等。在学生的卫生训练方面也有明确规定:每天早晚刷牙,每星期至少洗澡一次,饭前便后洗手,个人用自己的茶杯、食具和毛巾,每夜开窗,睡10个小时等;此外,相关工作人员还负有“指导学生卫生的自治组织”“注意身体自然的发展(禁止女生束胸、缠足)”等职责<sup>[12]</sup>。

#### (二)开展民众卫生教育

清末以来,政府已经有意识地推动卫生宣讲,将遵纪守法、增进道德与劝导卫生相结合。随着卫生观念的深入,民国政府对卫生教育有着更为详细的规定。比如,地方要“悬挂卫生标语牌,设置定期卫生布告栏,举行卫生运动会,举办卫生展览会,设立卫生陈列所,组织学生讲演队,分设卫生讲演场,推广卫生电影,发行卫生刊物”,等等<sup>[12]</sup>。20世纪30年代,江苏多地成立民众教育馆,承办卫生展览、卫生演讲会、组织清洁运动等工作。1935年,

学校发起成立了“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华健康教育研究会”两个全国性健康教育群众性团体,引领社会风气之先。同年,主编的《医政周刊》《卫生教育周刊》<sup>[13]</sup>正式发行,首届毕业生高梅芳、胡嵩山、孟浦等积极投稿,大力传播公共卫生新知识新理念。1946年,学校(已更名国立江苏医学院)更是在办学所在地——镇江成立江苏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举行卫生运动宣传周、发动夏令大扫除、清除垃圾、免费注射防疫针、设置平民供应站、改良厕所等,移风易俗,惠及百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三)开展传染病防控与救治

由于落后的卫生条件,加之战争和自然灾害,民国时期的瘟疫非常严重。据统计,在1912—1949年共发生死亡万人以上的巨灾75次,其中重大疫灾19次,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重大疫情发生<sup>[14]</sup>。1932年,陕西霍乱造成了13万~14万群众死亡。当时防疫救治的条件十分落后,全国大医院总计不过426所,小医院也不多,全国登记的医师、药师、助产士、药剂生总计不过10115人,全国正式的护士只有4000多人<sup>[12]</sup>。公共卫生的专业人员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方面强化对疫情的检测,力争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对接医疗机构,并前往疫区调查、指导防病工作;另一方面,开办从事疫病防治的专门培训班,为民众接种疫苗,兼顾公共卫生知识普及、社会调查统计、民众安抚等,维护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

#### (四)开展公共卫生科学研究

包括卫生教育科毕业生在内的公共卫生人才在一线工作,对于卫生“积极的在强健各个人之体格,增进全国人平均之年寿;消极的在杜绝传染病之侵袭,免意外伤亡”有着深切认知,积极推动系列研究和探索。在理论研究方面,对传染病产生机制、新病原体进化机制、宿主调节机制,以及与传染病相关的气候变化、人口流动、生活方式等进行有益探索。在方法研究方面,主张灌输合理有效的卫生知识,纠正有碍健康的不良习惯,打造清洁整齐的生活环境,大力推行健康新生活等。在政策研究方面,积极推动国家和地方出台因时因地制宜的政策。卫生教育科毕业生高梅芳曾主张,确定卫生教育系统,制定卫生教育法规,筹备卫生教育经费,训练卫生教育人才,普及学校儿童卫生教育设施,推广学校卫生教育事项,普及民众卫生教育事项等,建议政府组建“卫生教育委员会”一体推进各项政策,并力主各省、县均设置卫生教育委员会<sup>[12]</sup>。

由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共同努力,在国民政府前后,大众的卫生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卫生不再是一人一时修炼的私事,而是关涉民族种群健康的大事。胡定安更是指出:“由体育观念和预防

医学中之卫生观念、一切的改革心理与趋势观察起来,我们就可以明白民族力量的增进一定要提倡健康,尤其要提倡整个国民的健康,然后可以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sup>[15]</sup>“卫生”的公共性、美誉度不断提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清洁、健康、科学、美好等的代名词,当时社会甚至出现了以“卫生”相标榜的文化现象。一些报纸开始刊登各种进口药品和清洁杀菌类日用品广告,常常标注“卫生”以吸引普通民众的注意,一些“卫生”组合词语也开始出现。比如,进口的美国棉质内衣被叫作“卫生衣”,放在衣柜里的樟脑丸被叫作“卫生球”,厕所用纸也被称作“卫生纸”,连厕所都被称为“卫生间”,并沿用至今。

时光不居,岁月如流。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们看似在“卫生有道”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自信满满。然而,在新冠疫情刚刚结束的今天,再回首却发现当前应对疫情的宣教、隔离、洗手、消毒、戴口罩等诸多措施,恰是100年前先辈们引领卫生变革“新举措”的一部分。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仍需抱持着卫生之“道”,在人类健康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奋勇向前。

(谨以此文献给南京医科大学建校90周年。)

#### 参考文献

- [1]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毕业生纪念刊[A]. 南京医科大学档案馆,1935
- [2] 郭庆藩. 庄子集释(诸子集成本)[M]. 北京:中国书店,

- 1987:342
- [3] 袁沛然. 中国医学大成三编[M]. 长沙:岳麓书社,1994:784
- [4] 姚春鹏. 黄帝内经[M]. 北京:中华书局,2010:26
- [5] 黄子方. 中国卫生刍议·弁言[M]. 北京:中央防疫处疫务科印行,1927:1-4
- [6] 兰安生. 公医制——一项合乎中国国情的政策[J]. 中华医学杂志,1928(2):65-80
- [7] 王子珩. 公医制度与现代中国医学教育[J]. 国立中正医学院院刊,1942(1):3-10
- [8] 倜奴述. 公共卫生事业之要旨[J]. 安亭旅沪同乡报,1910(2):20
- [9] 余云岫. 传染病[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序文1
- [10] 华桂岳. 社会问题与现代医学之任务[J]. 医界春秋,1935(58):3
- [11] 胡定安. 江苏医政医学教育之回顾与前瞻[J]. 建苏月刊,1947:8
- [12] 王东胜,黄明豪. 民国时期健康教育文集[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7-102
- [13] 张爱林,夏媛媛. 民国《卫生教育周刊》研究[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5):463-467
- [14] 民国年间各种疫情几乎年年都会发生[EB/OL]. [2020-09-27]. [https://www.sohu.com/a/421138191\\_120180283](https://www.sohu.com/a/421138191_120180283)
- [15] 胡定安. 胡定安医事言论集[M]. [出版地不详]:中国医师改进社,1936:65

(本文编辑:姜鑫)

## Perspective on the change and influence of health concept from the inscription “proper health”

ZHANG Ailin

Jiangs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Health,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66, China

**Abstract:** Cai Yuanpei, a famous educator inscribed for first health department graduates of Jiangsu Provincial Medical and Political College in 1935 with high expectations and include the changing of times. Active actions in health policy, health educa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are needed.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Government which formed in 1928, the connotation of hygien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health preservation and longevity” to the public domai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 Jiangsu Provincial Medical and Political College were encouraged to actively serv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ublic health, thus realizing the concept of “proper health” with practical actions.

**Key words:** hygiene; public health; health education; Cai Yuanpei